论《樱桃园》与《茶馆》中的正义

《樱桃园》是一部俄国19世纪文学家契啊夫创作的四幕戏剧，其围绕着樱桃园的拍卖、易主与消失的一条故事线展开，反映了俄国19世纪末的社会变迁，暗含的旧贵族阶级的衰败与新兴资产实干家的倔起之冲突代表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锋，更是实现了新旧交纵之中新生活不可避免的降临。《茶馆》则是一部老舍创作的一部三幕剧，其中，老舍运用人物展览式的结构，“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物，展现了中国近代史中从清末至民国初期50年间的历史，从而“葬送三个时代”，表达了对旧时代的挽歌与愈发黑暗的中国社会中的腐败却又有希望。

在《樱桃园》与《茶馆》中，正义这一主题都被触及。的确，如哲学家罗素所说，正义是主观的，正义在这两部作品中也有不同的定义与实现方式。正义不可能被完全实现，尤其在人们价值观与追求相差甚多的时代下，可两部作品中都丰富展现了俄国与中国历史中正与恶的冲突以及群体对正义的不断探索与努力。本文将从人道主义，民族集体主义与政治潜流三个方面来分析《樱桃园》与《茶馆》中对正义的定义与实现。

在两部作品中，正义中的人道主义都可以从人心中的善良与共情力中所观察到，表现在对下层阶级的无私帮助与怜悯；与此同时，两部作品中的人道主义也受到了阻拦，或是恶的势力，又或是现实主义与正义感之间的冲突。在《樱桃园》中，女主角柳鲍芙为旧贵族阶级的代表，展现了旧贵族的惰性、空洞与虚荣，可她身上却充满了人性的天真、善良与烂漫，其行为也在人道主义的角度为正义做了贡献。柳鲍芙对于罗巴幸的关怀与帮助以及对于流浪汉的施舍便是人道正义的表现，在第一幕中，柳鲍芙出场之前，罗巴幸便在回忆独白中体现了柳鲍芙作为主人对他的关照。其中柳鲍芙说道，“小庄稼佬，别难过等你结婚了就好了。”在此，“小庄稼佬一词表示了两者之间地位身份之间的差异，也象征了不同阶级之间的分歧，可柳鲍芙与罗巴幸的情感却超出了主仆之间的关系，而是“像亲姐姐一样”。此处两者身份与态度的强烈对比凸现了柳鲍芙抛去贵族傲气后心中的平等与共情力，是对于阶级弱势群体的帮助，也是对人道主义正义的推动。另一个《樱桃园》中的例子来白于柳鲍芙对流浪汉的施舍，她说道：“我是一个银卢布都找不出来了....口袋里只摸到了这金卢布，你拿去吧！”这一金卢布展现了旧贵族柳鲍芙对下层人民的怜悯，也现了她人性之中的善良与正义。“摸不到卢布”表现了她的处境之困难，却依旧按照心中的美好与人道而行事，除此与之外，这也展现了柳鲍芙生活的过度浪漫化与不切实际，养女与罗巴幸对她一遍遍的阻止与劝说形成了时柳鲍芙天真的人道主义的反力，却也是在社会层面上向着新生活正义目标的步伐，从而体现了正义的主观性与多义性。

而在《茶馆》中，人道主义的正义也由王淑芬所展现。王淑芬是馆长王利发的妻子，“为人也更正直些。”她在康顺子被庞大监家人扔出家门后收留了康顺子康大力母子，为他们提供着住所、食物与安全，而此时正是战乱时分（“又他妈的放炮了！”），从此可以看出王淑芬不顾自身安危也要帮助他人，体现了她身上的正义闪光点。在《茶馆》中，有更多的反人性负面人物做着非正义的交易，例如刘麻子人口贩卖，老林老陈共娶一个老婆与庞太监买良家女子之妻，尤其在第一幕的落幕之时，庞太监说道，“我要活的，不要死的！哈哈！”由此可以看到人性冷血的一面，庞太监将康顺子物化，对她的生死谟不关心，无不体现了清末太监所代表的守旧力量的猖狂与腐败。在第二幕中康顺子所揭露的庞太监之死也是正义的实现方式之二。由此可见，在《樱桃园与《茶馆》中，人道主义正义都体现在人物的同理心与无私之中，却都受到了冲击与阻拦。

在民族集体感与复兴的正义方面中，《樱桃园》中包含较少的集体主义，却指明了一条通往复兴的新时代的路；《茶馆》中充斥着常四爷的民族集体感的一腔热血，却在最后走向越来越衰败的民族耻辱之中。民族的正义不是必然的，却是社会中积极力量的一大部分。《樱桃园》中外国势力冲淡了人物的集体感，例如费尔斯说道，“外国的一切早已圆满了”，皮希克的地里也被英国人发现“白胶泥”，体现了帝国主义入侵以及人们的麻木与不为所动，其中少数民族主义的正义感来自柳鲍芙的一句“上帝知道，我爱我的祖国，我爱得历害呀！”上，柳鲍芙抒情化的感叹唤醒了些许俄国人心中的民族正义感而她身着的“巴黎最时尚的衣裳”却在此时展现了讽刺感与谬误性，罗巴幸所走向的工业化、资本化理念也是俄国民族的光明未来，也使俄国在历史上又成为一支强大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势力，可罗巴幸作为商人心中想的是利润，在无意之中对祖国做出了贡献，这体现了正义的矛盾感与复杂性。

在《茶馆》中，常四爷与秦仲义心念人民，胸怀正义，却在最后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秦仲义主张实业救国，说到，“顶大顶大的工厂，……能抵制外货，才能救国！”这句话中包含了秦仲义对于民族复兴的向往与努力以及他对于自己心中的正义的前进。秦仲义的人物发展表现了人与社会环境的戏剧冲突。他从开始办工厂到风风火火，最后却因政府一句“逆产”失去所有，一无所获，这体现了社会动荡与政治压迫中正义的非必然性与艰难感。同样，常四爷一生为顺民，能够客观理智地批判政府而为民族的富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却在最后发出“我爱我的国，可谁爱我呐？”的绝望感慨，表现了民族正义的失落以及邪恶势力的胜出。此处，正义的实现不在于在现实情景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是在于众人最后的醒悟，只有在认知邪恶之后，才能追求正义，也为观众读者们敲响了民族正义的警钟。

政治正义是正义中最矛盾，最难以判断的一种，而在这两部作品中，《樱桃园》指向了一条人人劳动的实干派政治发展之路，而《茶馆》也埋藏了一条共产主义的政治正义潜流。《樱桃园》中樱桃园这一意象也有其政治动荡的含义，樱桃园的易主与消失代表了旧贵族保守政治势力的退去，以及新时代更加平等，更加资本化的政治力量的到来，现此处政治权力的交接也展了契诃夫对政治正义的思考与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在第二幕中，琴弦绷断的声音也暗示着新政治变革的到来。化石性人物费尔斯说道，“大灾难来临之前也有这种声音”，指代了农奴制的废除与更加平等的社会。此处，契诃夫运用场景塑造与声响效果暗指了改变解放的政治未来，在人们半歇斯底里时透露出的新时代的希望，

在《茶馆》中，康大力参加了西山的八路会，表示他投入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与壮大。“跟上康妈妈！”这一句台词是老舍对于共产党所带来的希望与未来的寄托，也表现了在国民党错误祸国殃民时期新的政治力量的默默涌动，为人们带来了政治正义上的新兴势力。在第四幕中，庞四奶奶与康顺子之间的纠纷也象征着新旧政治势力的冲突。庞四奶奶想要恢复皇帝制，推康顺子作老太后，代表了民国社会中守旧派与扶清派的政治力场，与此相对的是康家所代表的共产主义新政活力量，后文中康顺子拒绝庞四奶奶的提议也象征了社会中守归派的失势与共产主义往前走引领人民的未来。的确，随着茶馆墙上贴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莫谈国事”纸条，人们在黑暗与压迫中的挣扎与向着新思想的努力与憧憬为政治正义指出了一条可走的道路。

正如俄国著名文家家纳博秋夫所说“契柯夫笔下的可喜与可悲是浑然一样的。”他笔下《樱桃园》中的正义与邪恶也纵横交错，反复斗争，老舍也自道：“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综上所述，《樱桃园》与《茶馆》两部作品中正义由人道主义，民族集体与政治正义三个角度而定义与展开，在正义实现的非必然性之中指出了两个时代，两个国家走出奴役之路，通往正义之堂的希望与未来。

丰烁